

闻所未闻

Ni d'Eve ni d'Adam

[比利时] 阿梅丽·诺冬 著
胡小跃 译

Amélie Nothomb

人民文学出版社



闻所未闻

Ni d'Eve ni d'Adam

[比利时] 阿梅丽·诺冬 著

胡小跃 译

'mélie Notkomb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0-627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闻所未闻 / (比) 诺冬著; 胡小跃译.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485-2

I. ①闻… II. ①诺…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比利时-现代 IV. ①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272 号

Ni d'Eve ni d'Adam

Amélie Nothomb

©Editions Albin Michel, Paris 2007

特约策划: 何家炜

责任编辑: 黄凌霄

装帧设计: 董红红

闻所未闻

[比利时]阿梅丽 诺冬 著

胡小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5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6.0 插页 2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2000

ISBN 978-7-02-008485-2

定价: 22.00 元

学日语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去教法语。我在超市门口贴了一张小广告：“一对一法语辅导，价格从优”。

当天晚上，电话就来了。约第二天在表参道^①的一家咖啡馆里见面。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挂了电话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不知道怎样认出他来，他也同样。由于我刚才没想到问他的电话号码，我是没办法的了。“他也许会再打电话来。”我想。

他没有再打电话给我。听声音，他好像很年轻，但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一九八九年的东京可不缺年轻人，尤其是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左右在表参道的那家咖啡馆里。

① 表参道：东京繁华街区，那里名牌荟萃，店铺林立。

我也不是唯一的外国人，远非如此。不过，他径直向我走来。

“您是法语老师？”

“您怎么知道？”

他耸耸肩，很不自然地坐下来，不再说话。我明白我是老师，应该由我来问他。我问了几个问题，得知他今年二十岁，名叫伦理，在大学学法语。他也知道了我今年二十一岁，叫阿梅丽，学日语。他搞不清我的国籍。我对此已经习惯了^①。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再讲英语。”我说。

我用法语讲话，想测测他的法语程度。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问题最严重的是他的发音：如果我不知道伦理是在讲法语，我会以为他刚开始学中国话呢！他词汇贫乏，句法呢，蹩脚地模仿英语，好像那是他唯一的救命草。然而，他却已经在大学里学了三年法语。我由此断定，日本的语言教学是彻底失败了。差到这种程度，甚至都不能再以岛国封闭来解释了。

这个年轻人应该意识到了这一情况，因为他立即就作出道歉，然后沉默了。我无法接受这种失败，非

.....
^① 作者为比利时人，但生在日本，小时候在亚洲多个国家生活过，常常搞不清自己是哪国人，后自称是“无国界人士”。

要他重新开口不可。白费力气。他紧闭着嘴，好像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他的一口烂牙。我们陷入了僵局。

于是，我只能讲日语了。我五岁以后就没有再讲日语，阔别日本十六年之后，这是我到日出之国的第六天，不足以从我童年的记忆中重新激活这种语言，远远不够。所以，我跟他说了小孩子说的话，没头没尾，毫无逻辑，好像讲的是警察、狗和樱花树。

小伙子听我说着，惊讶得合不拢嘴，最后大笑起来。他问我教我日语的是不是一个五岁的小孩。

“是的，”我回答说，“这个小孩，就是我自己。”

于是我跟他讲起了自己的经历。我慢慢地用法语讲。由于充满了激情，我感觉到他听懂了我说的话。

他渐渐地不那么拘束了。

他用十分蹩脚的法语告诉我，他熟悉我所出生并在那里一直住到五岁的地方：关西。

他呢，出生在东京，父亲是一家著名珠宝学校的校长。他讲累了，停下来，端起咖啡，一饮而尽。

这番解释，好像让他费了好大的劲，就像不得不踩着几块相隔甚远的石头，要趟过洪水暴涨的河流似的。看到他完成这一壮举之后气喘吁吁，我乐得直想笑。

必须承认，法语是不好学的。我可不想跟我的学生换位。要讲好我的语言就像要写好他的语言那样难。

我问他在生活中喜欢什么。他想了很长时间。我很想知道这是一种生存思考还是语言方面的思考。他这样思索了很久之后终于回答了。他的回答让我猝不及防：

“玩。”

无法判断他的障碍来自语言方面还是思维方面。

我追问道：

“玩什么？”

他耸耸肩。

“玩。”

他的这种态度也许是因为一种令人赞叹的洒脱，也许是因为面对难学的法语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懒惰。

无论属于哪种情况，我都觉得小伙子很好地摆脱了困境。我完全赞同他。我对他说，您说得对，生活就是一场游戏：如果有人认为玩是因为无聊，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

他听着我说，好像我在奇谈怪论。和外国人讨论的好处是我们永远可以把对方惊愕的神情归结为文化差异。

伦理也问我我在生活中喜欢什么。我一字一句地回答说，我喜欢下雨的声音，喜欢在山中散步，喜欢看书、写字、听音乐。他打断我的话，说：

“玩。”

他为什么要重复自己的话？也许是想在这一点上跟我交换意见。于是我接着说：

“是的。我喜欢玩，尤其喜欢玩牌。”

这会儿，似乎轮到 he 不知所措了。我在本子的空白页上画了几张牌：A，草花，黑桃，方块。

他打断了我：是的，当然，他会打牌。我感到自己搬弄低级的教学法真是愚蠢极了。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我随口乱说起来：他喜欢吃什么菜？他不容置疑地回答说：

“几单。”

我觉得自己对日本菜还是了解的，但他说的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请他给我解释解释。他小心翼翼地重复道：

“几单。”

我听清楚了，但那是什么东西啊？

他愣了一下，从我手中拿过笔记本，在上面画了一个鸡蛋的轮廓。我花了好几秒钟脑子才反应过来，大叫起来：

“鸡蛋！”

他张开双眼，好像在说：对了！

我接过话头：“是这么说的：鸡蛋。”

“几单。”

“不。看着我的嘴，要把嘴张得更大一点：鸡蛋！”

他把嘴张得很大：

“几单。”

我问自己：这是一种发展吗？是的，因为它属于一种变化。如果不是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起码也朝另一件东西发展了。

“好多了。”我充满乐观地说。

他笑了笑，不太相信，但对我的礼貌感到很高兴。我是他所需要的教师。他问我要收多少学费。

“您愿给多少就给多少。”

这一回答掩饰了我在这方面的无知，我对该收多少学费完全没有概念，甚至都不知道大概该收多少。由于我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不得不像一个真正的日本人那样说话，因为伦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米纸做的漂亮信封，他事先已在信封里放了钱。

我尴尬地拒绝了：

“这次就算了。这不是正式的讲课，只是开场白

罢了。”

年轻人把信封放在我面前，然后去替我们的咖啡买单，回来后约我下周一见面。我试图把钱还给他，他看都没看，跟我道了别就走了。

我很难为情地打开信封，里面有六千日元。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现金总让人觉得钱很多，尤其是在数目不大的情况下。我又想起了“鸡蛋”变成了“几单”，觉得自己不值六千日元。

我在脑子里把日本的财富与比利时的财富作了比较，得出一个结论，这笔交易如海洋与一滴水，太不成比例了。用这六千日元，我可以到超市里买六个黄苹果。这一点，亚当完全应该要感谢夏娃。我心里平衡了，于是沿着表参道往上走。

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我成年后的第十天。自从得知要回去之后，每天早上拉开窗帘的时候，我都发现天是那么的蓝。后来，在很多年当中，在比利时拉开挂在沉甸甸的灰色铁架上的窗帘时，怎能不怀念东京的冬天？

我去表参道的那家咖啡馆和我的学生会面。上课的内容主要是当天的天气。这真是个好主意，因为对没有什么话要讲的人来说，天气是最好的话题。而在日本，天气是主要也是必须的谈话内容。

遇到某个人而不跟他谈论天气，就等于是您缺乏常识。

伦理好像比上次有进步，这不能说全是我教得好，他自己应该也下了功夫。也许，想跟一个讲法语的女子对话给了他动力。

他正在跟我讲夏天是多么难受，突然，我看见他抬起头，望着刚进来的一个小伙子。他们互相打了个手势。

“他是谁？”我问。

“原，我的一个同学。”

那个年轻人走过来打招呼。伦理用英语给我们作介绍。我生气了：

“请讲法语！您的朋友也是学法语的。”

我的学生重新给我们介绍。起初，有点结结巴巴，因为突然改变了语言体系。后来，他尽量咬字清楚：

“原，我给您介绍阿梅丽，我的情人。”

我差点没气疯，那种愤怒实在难以掩饰，发作起来肯定会让我的学生刚才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前功尽弃。但我没有当着他的朋友的面予以纠正：这会让他丢脸的。

那天也是巧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看见克里斯蒂娜也走了进来。那是个很讨人喜欢的比利时姑娘，在大使馆工作，曾帮我填过有关表格。

我远远地跟她打了个招呼。

我觉得现在该轮到我作介绍了。然而，激动之中的伦理也许想复习一下这句话，抢先对克里斯蒂

娜说：

“这是我的朋友原，这是我的情人阿梅丽。”

克里斯蒂娜扫了我一眼。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向两个小伙子介绍了克里斯蒂娜。由于这一误会，同时也怕让人觉得是我在主导爱情，我不敢再命令我的学生。让法语成为交流的语言，这是惟一可行的事情，我把它定为自己的目标。

“你们俩都是比利时人？”原问道。

“是的，”克里斯蒂娜微笑着说，“你们的法语讲得很好。”

“多亏阿梅丽，她是我的……”

我连忙打断伦理的话，说：

“原和伦理在大学里是学法语的。”

“是的，但没有这样的小灶吃，不是吗？”

克里斯蒂娜的态度让我感到有些不自然，因为我和她并没有亲密到那种程度能让我向她解释真实的情况。

“您是在哪里遇到阿梅丽的？”她问伦理。

“在麻布超市。”

“真有意思！”

幸好他没有说我们是通过一则小广告认识的。

女侍者过来问原和克里斯蒂娜要点什么。克里斯蒂娜看看表，说她要去开会，时间快到了。临走时，

她用荷兰语对我说：

“他很英俊。我为您感到高兴。”

她走了之后，原问我她讲的是否是比利时语。我点点头说是的，因为我不想作解释，那说来就话长了。

“可您的法语讲得很好。”伦理赞赏道。

“又是一个误会。”我沮丧地想。^①

我再也没有力气了，便让原和伦理用法语对话，当他们错得实在太离谱的时候我才去纠正。但他们接下来的话让我很吃惊：

“如果您星期六来我家，带瓶广岛酱来。”

“靖会跟我们一起玩吗？”

“不会。他去南家。”

我想知道他们玩什么，便问原。他的回答并不比我的学生在上一堂课给我的回答更让我明白。

“星期六，您也来，到我家里来玩。”原说。

我敢肯定他邀请我是出于礼貌，但很想接受。我怕我去会影响我的学生，便试探着说：

“我对东京不熟，怕找不到。”

伦理建议说：“我来接您。”

我放心了，激动地谢了原。当伦理把装着薪水的

^① 比利时通行三种语言：法语、荷兰语和德语，并不存在比利时语。

信封递给我时，我感到比上一次还难为情。我决定用这笔钱给主人买一个蛋糕。这样一想，心里才平静下来。

星期六下午，一辆豪华的白色奔驰轿车来到我的住处门口，车子干净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当我走过去的时候，车门自动打开了。开车的是我的学生。

当车子穿梭在东京的大街上时，我在想，尽管他父亲是珠宝学校的校长，但这辆车还是让人觉得是属于黑手党的，这是黑手党的典型车型。我没有问他。伦理一声不吭地开着车，精神很集中，因为街上的车很多。

我在角落里看着他的侧影，想起了克里斯蒂娜跟我讲的荷兰语。如果不是我的女同胞对我说他很英俊，我绝不会觉得他英俊。而且，我真的不觉得他很英俊。不过，他刮得干干净净的脖颈挺挺的，脸上的神色像是被凝住似的，这倒使他显得有些出尔不凡。

这是我第三次看他。他总是穿着同样的服装：蓝

色的牛仔裤，白色 T 恤衫，黑色的麂皮运动衣，脚蹬宇航鞋。他清瘦得让我有些不敢相信。

跟在后面的一辆车子撞了上来，这还不算，司机还下车对着伦理破口大骂。我的学生十分平静，深深地道歉。那个粗鲁的家伙走了。

我大叫起来：“可这是他的错！”

“是的。”伦理不动声色地说。

“那您为什么还向他道歉？”

“我不知道用法语怎么讲。”

“那用日语讲啊！”

“Kankokujin. ①”

韩国人。我明白了。我心里暗自嘲笑这个学生无药可救的礼貌。

原住在一个微型公寓里。伦理递给他一大纸箱广岛酱。我感到自己提着一扎比利时啤酒傻傻的，却不料啤酒受到了欢迎，他们真的感到很好奇。

朋友中有个叫雅的，正在切白菜丝，还有一个叫阿迷的年轻美国女子。她的在场迫使我们不得不讲英语，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让我感到更不开心的是，

① Kankokujin, 日语，意为“韩国人”。